

# 明清之際朝鮮王朝對 臺灣鄭氏政權的關注與情報的應對\*

雷雨晴\*\*

## 摘要

明清易代，朝鮮王朝雖被迫成為清朝藩屬國，但「尊明」理念一直不絕，積極搜尋與明及南明政權相關的各方情報，即如他們對於奉南明正朔的臺灣鄭氏政權相當關注。但朝鮮王朝與鄭氏政權幾乎沒有官方接觸，只是朝鮮主動搜集情報。情報來源主要有三：燕行使、漂流民、日本。情報來源不同，情報特色各異，各途徑組成複雜的東亞情報網絡，亦影響著朝鮮王朝的內政外交，如漂流民政策的調整、築城設防、渡海通鄭之議，以及引起朝鮮震動的「偽倭書事件」。其中不僅包含朝鮮王朝對臺灣鄭氏政權的認知與想象，亦有助於透視明清之際朝鮮內部的政治環境與對華觀念。

**關鍵詞：**明清之際、朝鮮王朝、鄭氏政權、中朝關係、情報交流

---

2023年9月2日收稿，2024年2月5日修訂完成，2024年4月29日通過刊登。

\* 本文屬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韓國漢文史部文獻編年與專題研究」(項目編號：21&ZD242)階段性成果。

\*\* 作者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 一、前 言

1644 年三月十九日，在李自成攻城的炮火聲中，崇禎帝自縊於煤山，明朝滅亡。隨後，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多爾袞入主北京，逐漸控制全國。朱明殘餘勢力在南方，先後建立弘光（1644-1645）、隆武（1645-1646）和永曆（1647-1661）等政權。鄭氏政權作為明末清初閩臺地區的政治、軍事集團，亦是東亞海域稱霸一時的海商集團。其創始於鄭芝龍（1604-1661）1625 年對李旦和顏思齊海商事業的繼承，後經鄭成功（1624-1662）、鄭經（1642-1681）和鄭克塽（1670-1707）經營，始終奉南明正朔。1659 年南京之役中鄭軍慘敗，兩年後，鄭成功東征臺灣，作為新的反清陣地，1662 年驅逐荷蘭殖民者，同年農曆五月，鄭成功病逝。鄭經統治時，與耿精忠、吳三桂等合作，在「三藩之亂」（1673-1681）中發揮重要作用。1683 年鄭克塽降清，存續近六十年的鄭氏政權方告終結。

鄭氏政權存續時期，對應朝鮮王朝自光海君（1608-1623 年在位）末年，經仁祖（1623-1649 年在位）、孝宗（1649-1659 年在位）、顯宗（1659-1674 年在位），至肅宗（1674-1720 年在位）即位九年止。期間朝鮮王朝經歷了來自新興滿族政權的重創，1627 年丁卯之役後，雙方約為兄弟之國。十年後的丙子之役，朝鮮徹底屈服於清朝武力，被迫成為清朝藩屬國。但在儒家理學影響下，朝鮮君臣堅守「尊周攘夷」的理念，<sup>1</sup> 堅信清朝的統治不會長久，始終關注各方反清勢力，多方獲取相關情報，逐漸得知鄭氏政權的存在。本文著眼於朝鮮王朝所獲之鄭氏政權情報，分析情報內容及所呈現特點，考察朝鮮之現實應對，管窺明清之際東亞局勢，以就教於方家。

## 二、朝鮮王朝搜集臺灣鄭氏政權情報之路徑

學界關於明清鼎革之際中朝關係的研究成果已相當豐富，對朝鮮王

---

1 參見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初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 修訂本）。

朝的情報搜集活動亦多有關注。<sup>2</sup> 已有成果或以特定事件如「三藩之亂」為中心，或以某一特定渠道為側重，關注核心多為清鮮關係或日朝關係。本文則強調鄭氏政權存續期間，朝鮮王朝針對鄭氏政權的情報搜集。綜合觀之，朝鮮王朝搜集鄭氏政權情報的途徑有三：燕行使、漂流民及日本。

### (一) 朝鮮燕行使對鄭氏政權情報的搜集

作為中國藩屬國，朝鮮王朝每年數次遣使來朝，形成獨特的「使行外交」，這既是中朝交通的紐帶，也是朝鮮收集情報最重要的方式。<sup>3</sup> 清朝

- 2 關於這一時期朝鮮王朝的情報搜集活動，可參考王桂東、達力扎布，〈清「三藩之亂」期間朝鮮對清朝情報的搜集〉，《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4.4(2013.8): 60-63；陳波，〈對馬倭書與朝鮮傳聞——朝鮮與日本圍繞三藩之亂的情報交涉〉，《國家航海》13.4(2015.12): 1-18；陳波，〈明清鼎革期間清朝與朝鮮之間朝貢外交的實態——以〈燕行錄〉為中心的考察〉，《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34(2018): 302-317；陳波，《風說書的世界——東亞視域下的明清鼎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丁晨楠，〈明清鼎革期朝鮮的明朝塘報搜集與應對〉，《韓國研究論叢》37.1(2019.6): 17-28；丁晨楠，〈16世紀朝鮮對明朝情報的搜集與應對〉，《古代文明》15.1(2021.1): 145-160；（日）浦廉一，〈台灣鄭氏（特に鄭經）と朝鮮との關係〉，《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3(1953.2): 71-92；張存武，〈朝鮮對清外交機密費之研究〉，《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86-146；沈玉慧，〈清代北京における朝鮮使節と琉球使節の邂逅〉，《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37(2009.3): 93-114、〈清代北京における朝貢使節間の交流——朝鮮・琉球使節を例とし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39(2011.4): 112-144、〈清代朝鮮使節在北京の琉球情報収集〉，《漢學研究》29.3(2011.9): 155-190、〈清代朝鮮燕行使による琉球情報の収集——使節交流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學報》94.4(2013.3): 31-64；伍躍，〈朝貢關係と情報収集——朝鮮王朝对中国外交を考えるに際して〉，收入（日）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頁 185-220；（日）松浦章，〈琉球通事から朝鮮使節に伝えられた台湾鄭經・琉球情報〉，《清代中国琉球交渉史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頁 335-350、〈朝鮮使節が北京で邂逅した琉球使節〉，《近世東アジア海域の文化交渉》（京都：思文閣出版，2010），頁 161-182；（韓）禹仁秀，〈17세기 후반 台湾 鄭氏海上勢力에 대한 조선의 정보 수집과 그 의미〉，《대구사학》8(2010): 163-187；（韓）金昌洙，〈17세기 후반 朝鮮使臣의 공식보고와 정치적 과장〉，《사학연구》106(2012.6): 141-173。
- 3 朝鮮每年都數次遣使至北京，這些使節在明朝通常被稱為朝天使。清鮮建立正式宗藩關係後，朝鮮秉持著傳統華夷觀念和「小中華」意識，將赴清使臣改稱「燕行使」。

入關後，對待朝鮮來使的政策發生轉變，將沿襲自明朝的冬至、正朝、聖節、歲幣等四次使團合為三節年貢使，簡稱節使或冬至使；取消明朝時期的千秋使；由於清初兩國關係不穩定，不定期的奏請使、陳奏使、謝恩使、進賀使等仍往來頻繁，稱為別使。<sup>4</sup> 朝鮮使臣歸國後，除將情報口頭彙報國王以外，隨行書狀官還要撰寫報告書。這些情報廣泛存在於《朝鮮王朝實錄》、《備邊司謄錄》、《承政院日記》、《同文彙考》及燕行使私撰之日記、筆記和文集中，其中就包含大量鄭氏政權相關資訊。如孝宗五年（1654），進賀兼冬至使書狀官沈世鼎彙報：

鄭芝龍之子尚據九江府，清人數攻不利，遣使封為王，鄭不受王印，曰：「爾國若使我統領此地八州，則猶可羈屬，若令入朝，則斷不可從也。」清又遣使使之剃頭，鄭慢辭拒之。鄭祖母本倭女，故頗有請救於倭之云。<sup>5</sup>

談及清兵攻打鄭成功不利，有招降之舉，但被拒。又提及「鄭祖母本倭女」，故有乞師日本之舉，但言其「尚據九江府」，又係道聽途說之言，可見真中有假，假假真真。顯宗即位年（1659）十月，告訃使鄭維城彙報鄭成功曾攻打南京：

臣等初入去時，北京洶洶，問其由，則鄭芝龍之子，率舟師三十萬剽掠江、淮而來。及其勝捷，廷臣以統一請賀，不許云矣……永曆皇帝則不知所在。而通報有曰：「國姓死於亂軍中。」國姓云者，疑是朱氏之為王者。芝龍之子，以其父見擒於清國，故改姓名為郭信，及其全師陷沒，脫身而走，不知生死云矣。<sup>6</sup>

---

這些使臣不僅在履行其使命的政治和外交方面發揮作用，亦給朝鮮經濟、社會，以至文化和思想方面帶來了巨大影響。

4 張存武，〈朝鮮對清外交機密費之研究〉，頁 409。

5 《同文彙考》第 2 冊補編（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78），卷 1〈使臣別單 1〉「甲午（孝宗五年）進賀兼冬至行書狀官沈世鼎聞見事件」，頁 1569。

6 《朝鮮顯宗改修實錄》第 37 冊（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顯宗即位年十月丁未」條，頁 127。本文有關朝鮮各王朝實錄皆出自於《朝鮮王朝實錄》，不另註。

基於此時據南京之役結束方兩月，南來情報的核實與傳遞頗費時日，對鄭成功敗走後下落不甚明瞭也在情理之中。此外，鄭維城以「國姓」為「朱氏之王」，不知其與後文之「郭信」皆為鄭成功，使得這段讀來顯得混亂。四年後（1663），冬至正使呂爾載等人帶回的情報，主要圍繞中原各方勢力展開，其中提到「鄭芝龍、孫莞，入據海島請降，則清人曰：『欲來，來；不欲來，不必來』云」。<sup>7</sup> 其後，自清「三藩之亂」爆發至鄭氏政權降清後的幾年，朝鮮燕行使幾乎每年都有鄭氏情報的彙報，少則一次，多則數次，這表明，鄭氏政權是燕行使在京期間的重點關注對象。

燕行使情報搜集手段多樣，包括並不限於購買違禁書籍、收購清朝公文、賄賂清朝官員、士卒、漢族士人，及出使北京期間向他國使臣、被擄朝鮮人或譯官等打探消息。雖說來源龐雜，消息準確性無法得到充分保證，但足見朝鮮王朝之重視。

## （二）朝鮮王朝與鄭氏政權的實際接觸：以漂流民為中心

臺灣鄭氏政權以海上貿易立足於東亞，商船往來不絕，雖與朝鮮王朝無官方直接往來，但因海難漂流到朝鮮的官商群體，卻使二者有了實際接觸。據朝鮮漂流民救助制度，漂流到朝鮮海域的外籍漂流民，須接受多次審問。審問內容不僅包括個人資訊、出航目的、漂流經過、裝船物品等基本資訊，還包括漂流民所知的各方情報。<sup>8</sup>

仁祖二十五年（1647）的徐勝漂流事件，應是朝鮮王朝與鄭氏政權交流的最早記載。徐勝一行代表的是鄭芝龍治下的南明官商，朝鮮十分重視，「朝廷遣譯官，更問中原事情」，感慨「自南、北京陷於清人，中原聲問久絕，至是因勝等，始聞之。」<sup>9</sup> 臺灣鄭氏政權作為反清復明勢力被朝鮮王朝所熟知，很大部分原因是由於奉南明正朔，即鄭氏政權是作為南明的一部分被關注到的，因此，朝鮮王朝對南明的關注，是影響其對鄭氏政權認知與想像的重要因素。

7 《朝鮮顯宗改修實錄》第 37 冊，「顯宗四年三月己巳」條，頁 306。

8 崔英花，〈清代中國漂流民與朝鮮的中國情報收集〉，《韓國研究論叢》39.1(2020.6): 120。

9 《朝鮮仁祖實錄》第 35 冊，「仁祖二十五年七月丁巳」條，頁 306。

在中朝關係中產生重大影響的漂流民事件，是 1667 年臺灣鄭氏官商林寅觀、曾勝、陳得等九十五人漂至濟州島後引發的，又稱「丁未漂流民」事件。這年五月，一艘商船漂停濟州島，該船首領自稱永曆皇帝所派「大明福建省官商人」，著明朝服飾，不剃髮，操漢音，儼然明朝人形象。濟州島官員立即向朝廷報告此事。經查，他們是臺灣鄭經手下的（官）商人，在前往日本的途中遭風漂流至朝鮮，船上還搭載紅衣大炮兩口。這一事件在朝鮮君臣中引起熱議，在近三個月的時間裡，朝鮮君臣多次就如何處理這些「大明」漂流民展開激烈討論，官員之間甚至互相彈劾。<sup>10</sup>

林寅觀等人特殊的明遺民身分也吸引了朝鮮士人的目光。在被押往漢城的途中，不少朝鮮儒生與之筆談，他們的到來讓朝鮮士人切實感受到南明的存在，也激發了對明朝的思念，「東國人士……相與握手慷慨，吐肝膽、垂涕泣，如聞父母之音」。<sup>11</sup> 朝鮮大儒成海應將諸筆談輯成《丁未傳信錄》，主要收錄了李瑄、柳世翊、金宅三、李敏迪、閔徽繼、黃功等人與漂人們問答情形，尤以李瑄之《漂人問答》與黃功之《黃陳問答》最為詳盡。<sup>12</sup> 從官私兩方記載來看，林寅觀一行為朝鮮王朝帶來了多方情

10 關於丁未漂流人事件的研究成果，主要可參考陳尚勝，〈禮義觀與現實衝突——李朝政府對於清初漂流海商政策波動的研究〉，《韓國學論文集》第 4 輯（北京：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1995），頁 259-266；高志超，〈漢人漂流民與中朝、日朝間交涉（1641-1689）〉，《東北史地》2014.5(2014.10): 32-38；孫衛國，〈義理與現實的衝突：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之尊明貶清文化心態〉，《漢學研究》25.2(2007.12): 187-210；又見《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44-18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第 7 章；黃普基，〈十七世紀後期朝鮮王朝政壇的「奉清」「崇明」之辨——以 1667 年南明漂流民事件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2018.6): 76；（韓）閔斗基，〈16-17 세기 표류 중국인에 대한 조선의 인식과 대응: 「人情」과 「大義」 및 「事大」라는 측면을 중심으로〉，《해항도시문화교섭학》23(2020.10): 1-36；（韓）禹景燮，〈명칭교체기 조선에 표류한漢人들——1667년 林寅觀 사건을 중심으로〉，《朝鮮時代史學報》88(2019.3):47-76；（韓）金文植，〈成海應이 증보한〈丁未傳信錄〉〉，《震檀學報》115(2012.8): 93-122。

11 （韓）成海應，《研經齋全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274 冊，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卷 31〈風泉錄一·丁未傳信錄序〉，頁 185。

12 成海應（1760-1839），字龍汝，號研經齋。他出身世家門第，是朝鮮王朝後期著名

報，包括：鄭氏政權與永曆的關係、崇禎敗亡原因、清入關後中原民心動向、儒家傳統的繼承及社會運營模式的變化，並涉及中國各省之間的距離、福建與臺灣的地方物產等人文地理情況，及鄭氏政權對日貿易等資訊。漂人問答中多處記載朝鮮儒生對漂流人所著大明服飾的關心，甚至批評漂人的衣冠不合明朝禮制。

此後，又有 1670 年沈三、郭十、蔡龍、楊仁等六十餘人漂至濟州，「自言本以大明廣東、福建、浙江等地人」，給朝鮮帶去關於臺灣鄭氏政權和澳門地區的消息。<sup>13</sup> 1681 年，清人高子英等二十六人漂至朝鮮，朝鮮譯官李慶和等在將其送回北京之際，打探中國情報，除「三藩之亂」戰況外，還有鄭成功與鄭經的主要經歷。但情報的準確性需要考察，如吳三桂死於康熙十七年（1678），並非情報所言在康熙十六年，又載「鄭錦即國信之子，國信奉弘光帝守南京」，但鄭成功所奉為隆武，並非弘光。<sup>14</sup> 1686 年漢人游魏等八十餘人漂至珍島南桃浦，自稱居住在「福建臺灣地」，朝鮮此時已知臺灣被納入清朝版圖之事，但卻仍將鄭克塽錯當成鄭芝龍之孫。<sup>15</sup> 1687 和 1688 年，分別有顧如商等六十五人和沈電如等十五人漂流至朝鮮，備邊司官員對包含鄭氏政權在內的中國情況進行了仔細詢問，漂流人均予以回答。<sup>16</sup>

### （三）朝鮮王朝與日本關於鄭氏政權的情報往來

十七世紀三十年代初，日本實行鎖國政策，僅保持與中國、朝鮮及荷蘭的有限貿易。在與日本的唐船貿易中，鄭氏海商扮演了重要角色。對

---

的思想家、史學家、實學家。1839 年，成海應以八十高齡辭世，其侄成佑為其編輯文集《研經齋全集》，凡 164 卷，分經翼、史料、子餘、載籍四門類。其中史料門又分為六類，三十卷，主要有《南明書》、《皇明遺民傳》、《丁未傳信錄》等等。

13 《朝鮮顯宗改修實錄》第 38 冊，「顯宗十一年七月丙寅」條，頁 28。

14 《朝鮮肅宗實錄》第 38 冊，「肅宗七年八月丁亥」條，頁 545。

15 《朝鮮顯宗改修實錄》第 39 冊，「肅宗十二年七月戊申」條，頁 73。

16 （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備邊司謄錄》第 41 冊（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82），「肅宗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濟州에 표류한 중국인의 사정을 물은別單을 올리는 備邊司의 啓」，頁 44b；《備邊司謄錄》第 42 冊，「肅宗十四年九月二十日·濟州漂流漢人에게 情狀을 물은別單」，頁 79a。

此，日本林春勝和林信篤父子所編寫的《華夷變態》一書收錄了大量原始史料，據載，鄭氏屬下的東寧船「每年商舶往來長崎無絕」。<sup>17</sup>除數量龐大的經濟往來外，鄭氏家族亦有多次「乞師日本」之舉。隆武元年（1645），水師先鋒提督副將崔芝發出請援書簡，信中表明，鄭芝龍「欲報明朝之厚恩」「平韃靼，再興明朝。然兵力不足，有意請日本援助」，<sup>18</sup>清代史書《東南紀事》亦載，雙方「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財」，<sup>19</sup>雖具體日期記載有別，但大致情形相符。日本對此「謝遣而不報」，但仍「賜以軍糧」。<sup>20</sup>鄭芝龍降清後，鄭成功不僅繼承了與日本列島的傳統聯繫，還以明朝代表的身分尋求加強與德川幕府的戰略關係。<sup>21</sup>「三藩之亂」初，延平王戶官楊英便致信長崎奉行，嘗試引起日本對中國局勢之興趣。<sup>22</sup>日本雖未公開出兵，但仍在嚴禁武器輸出的情況下，允許鄭氏政權採購銅、鉛、腰刀、角甲等軍事物資和武器裝備。<sup>23</sup>幕府保持與鄭氏政權的聯繫，直至 1683 年清朝統一臺灣。<sup>24</sup>

鑑於此，日本較朝鮮王朝而言，更充分地掌握著鄭氏政權情報。在

17 (日)林春勝、林信篤，《華夷變態》(東京：東方書店，1981)，頁 46。又根據孫文對《華夷變態》中各地區赴日商船數量的統計和比較，1674-1683 年之間至少有 252 艘來自不同地區的「唐船」到達日本，其中包含 123 艘以上的商船無法確定具體的出發港，即便如此，東寧船仍有 32 艘，在所有商船中占比最高。見孫文，「《華夷變態》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9)，頁 118。

18 (日)林春勝、林信篤，《華夷變態》，頁 15-16。

19 清·邵廷采等著，《東南紀事（外十二種）》(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卷 10，頁 296-297。

20 (日)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17。

21 (日)林春勝、林信篤，《華夷變態》，頁 23。

22 同上註，頁 73、74。

23 (日)林燿等編，《通航一覽》第五(大阪：清文堂出版，1967)，卷 213〈鄭成功贈歸化朱舜水書〉，頁 406-407。

24 可參考牛建強，〈從風說書看日本德川幕府對清朝情勢的關注〉，《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6(2008.11): 75-80；陳尚勝，〈論日本江戶幕府對清朝統一台灣問題的關注——以〈華夷變態〉為中心〉，《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2(2014.2): 120-128。



近世鎖國體制下，日本發展出一套完善的海外情報搜集制度。<sup>25</sup> 一是通過長崎口岸對中國商船的例行詢問，如現存於《華夷變態》、《通航一覽》以及《唐通事會所日錄》中的詳細記錄等；二是由對馬藩或設在釜山的倭館，通過往來朝鮮進行情報收集；<sup>26</sup> 三是利用薩摩藩與琉球的關係，通過琉球赴華使臣，獲取有關中國巨變的情報。<sup>27</sup> 三者鉤織成一張龐大的網路，有效搜集中國情報。<sup>28</sup> 所獲情報又通過對馬藩和朝鮮通信使參與到與朝鮮王朝的資訊交流中，成為朝鮮獲知鄭氏政權情報的又一重要來源。<sup>29</sup>

25 東亞地區不同政權間早已形成巨大的情報網絡，尤其是萬曆朝鮮之役的發生，賦予了中（明）、日、朝以及琉球四國之間的交流新的內容和意義，對立國家出於戰略考慮，積極開展對他國情報的搜集和研究等活動。見鄭潔西，《跨境人員、情報網絡、封貢危機：萬曆朝鮮戰爭與 16 世紀末的東亞》（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頁 97。

26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導言〉，《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第 1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頁 10-11。又，壬辰戰爭之後，德川幕府在日本建立起相對統一的中央集權政權，於 1609 年同朝鮮締結以「通信使」為紐帶的《己酉條約》，結束了日朝之間的敵對狀態。因此，雖然明清鼎革之際中日並未建立官方聯繫，但日朝之間早已恢復邦交。

27 當時琉球的內政外交皆處於日本的嚴密監視之下，同時又與清朝締結了宗藩關係，但清琉之間的宗藩關係因臺灣鄭氏政權而並不穩固。鄭氏兵船在三藩之亂爆發前夜，兩度（1670 及 1673 年）攻擊琉球貢船，引起臺灣鄭氏政權與日本及琉球關係緊張，也使得琉球對於三藩之亂的態度，持有相當程度的保留。1674 年三藩之亂爆發後，琉球使團成員大部被羈留福州，對於耿精忠政權有近距離的觀察。見陳波，〈三藩之亂期間琉球王國的外交抉擇——以〈華夷變態〉的記載為中心〉，《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32(2017.1): 103-114。

28 仲光亮，〈從臺灣朱一貴起義資訊看日本江戶幕府的情報網絡〉，《歷史檔案》2013.2 (2013.6): 67-68。

29 相關研究可參考（日）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程永超：《華夷變態の東アジア：近世日本・朝鮮・中国三国關係史の研究》（大阪：清文堂出版，2021）。夫馬氏對通信使的研究是對其燕行使研究的延續，主要關注十八九世紀朝鮮通信使對日本古學的了解，程氏則更全面地關注到倭情咨文、通信使筆談、倭館貿易等多方問題，亦詳細介紹對馬藩在日朝情報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情報搜集涉及丙子之役、明清易代、三藩之亂等諸多議題，突出了近世日韓關係背後不可忽視的中國因素。

如顯宗十五年（1674）三月，朝鮮君臣已知「三藩之亂」爆發，而日本則在當年五月通過唐船獲得了吳三桂與鄭經之反清檄文，且通過福州船員的口述得知更多詳情。僅兩月後，對馬宗氏便將所獲情報知會朝鮮東萊府使，其中提到「錦舍亦以十萬兵、九百艘，海陸合勢，期以六月進取南京」。<sup>30</sup> 次年六月，對馬島太守平義真書至，其書皮封大書雙行曰：「問華戎兵事、鄰壤安否，遺禮部大人。」<sup>31</sup> 向朝鮮探聽中原情勢。肅宗二年（1676），隨著對馬島情報不斷傳來，朝鮮獲知更多鄭氏政權與三藩之亂的細節，瞭解到鄭經有乞師日本之舉，甚至認為反清形勢一片大好。<sup>32</sup>

朝日之間另一情報往來高潮是鄭氏政權降清後的 1683-1684 年。在此之前的 1680 年，朝鮮東萊倭館曾有過關於鄭經與日本通信的情報，主要是對施亥通清導致鄭氏戰敗的情況說明。<sup>33</sup> 1683 年四月，日本和燕行使雙重情報皆言鄭經之死訊，<sup>34</sup> 但當年九月，東萊府使卻傳來鄭經大破清軍的錯誤情報，朝鮮認為「倭人所傳文字，語多不可了，而所言多涉虛妄，有不可信」。<sup>35</sup> 至十二月，對馬宗守所送書信中，仍有鄭經可能入侵朝鮮以及清朝「以不道之難」譴責朝鮮的傳言，朝鮮遣使對馬島行賄密探，對馬島則將錯誤歸結到長崎漢商身上，<sup>36</sup> 朝鮮認為對馬藩有意欺詐，自己不僅未能識破，還花費精力行賄，實在自取其辱。可見日朝之間的交流存在信任危機，雙方均有試探之意。即使到了肅宗二十九年（1703），在與對馬島使臣進行情報交流時，朝鮮的態度始終是將信將疑，認為：「狡倭情偽，有不可信，而邊情相關，不敢不聞。」<sup>37</sup> 由此可知，朝鮮對待日方情報心態十分複雜，既認為日本不可信，又因為關涉政權安危，不得不廣搜博取。

30 （韓）禮曹典客司編，《邊例集要》（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憲宗七年（1841）以後筆寫本，番號：奎貴 2089），卷 17〈雜條〉「甲寅七月」條，頁 14a。

31 《朝鮮肅宗實錄》第 38 冊，「肅宗元年六月庚申」條，頁 287。

32 同上註，「肅宗二年一月丙申」條，頁 318。

33 同上註，「肅宗六年七月丁酉」條，頁 463。

34 同上註，「肅宗九年四月辛丑」條，頁 640。

35 同上註，「肅宗九年七月丁酉」條，頁 660。

36 同上註，「肅宗十年三月丁丑」條，頁 682。

37 同上註，第 40 冊，「肅宗二十九年五月庚申」條，頁 26。

### 三、朝鮮王朝所獲鄭氏政權情報特點

從燕行使、漂流民和日本三方渠道，朝鮮王朝全面搜集鄭氏政權資訊，而情報來源不同，特點亦有所差異。分析朝鮮所獲鄭氏政權情報的多重特點及原因，既有助於把握東亞情報網絡的重要一角，也能充分突顯明清鼎革之際朝鮮王朝的現實關懷。

#### (一) 鄭氏政權情報的時間分布

從情報時間分布上看，鄭氏政權並非在明清鼎革的第一時間就進入到朝鮮王朝視野。儘管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初均有鄭氏情報到來，但集中爆發則是在清軍入關、崇禎自縊的十年之後，尤以清「三藩之亂」期間為甚，其次則是鄭氏投降後的最初幾年。<sup>38</sup>以燕行使所獲情報為例，「三藩之亂」爆發前，僅有前文所載之零星情報，「三藩之亂」期間，收到燕行使報告鄭氏相關情報十五次，「三藩之亂」結束後的五年裡，亦有十餘次彙報。這一分布與日朝之間關於鄭氏政權的情報交流情況同樣吻合，僅肅宗二年，朝鮮便收到四次來自對馬島的鄭氏情報，其次則是鄭氏降清的1683年，有三條來自日本的鄭氏資訊。僅從數量上看，「三藩之亂」期間所獲鄭氏政權情報，占總數的一半以上。

究其原因，一方面，鄭氏政權在十七世紀中期以後漸成大勢，清「三藩之亂」是鄭氏反清高潮之一。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吳三桂藉清政府「削藩」之議起兵反叛，一時「天下騷動，偽檄一傳，四方回應」，<sup>39</sup>蒙古察哈爾部、臺灣鄭氏政權趁機高舉反清大旗。「三藩之亂」的興起對於朝鮮尊周派來說是莫大的鼓舞，也是朝鮮關注「三藩之亂」與鄭氏政權的現實動因。另外，作為藩屬國的朝鮮，在清朝發生戰亂時，有可能被要求出兵支援，助清平叛；<sup>40</sup>清朝的成敗也關係到清鮮宗藩關係之維

38 因漂流事件無明顯時間規律，漂人身份和人數亦決定了情報重要性不同，故無法對從漂流民處所獲情報進行時間上的對比考察，僅從影響上看，1667年「丁未漂流民」事件留下的資訊最為豐富。

39 《清聖祖實錄》第4冊，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99「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癸巳」條，頁1246。

40 《朝鮮肅宗實錄》第38冊，「肅宗即位年十一月壬午」條，頁222。

繫。清若勝，則朝鮮需要繼續保持這種「屈辱」的從屬關係，而清一旦失利，則可能退至朝鮮西北邊境，給朝鮮的安全帶來威脅。故朝鮮自「三藩之亂」發生便密切關注。

另一方面，入關之初，清朝對朝鮮王朝嚴格防範、嚴密監視，對燕行使實施嚴格門禁。朝鮮北學派先驅洪大容（1731-1783）對此有過詳細記述和評價：

貢使入燕，自皇明時已有門禁，不得擅出遊觀，為使者呈文以請，或許之，終不能無間也。清主中國以來，弭兵屬耳，恫疑未已，禁之益嚴。至康熙末年，天下已安，謂東方不足憂，禁防少解，然遊觀猶托汲水行，無敢公然出入也。<sup>41</sup>

清初燕行使的情報搜集活動因此受到很大制約，這也是為何即使有南方傳聞，卻無法核實，且情報數量十分有限。直至乾隆以後，朝鮮使臣才可任意出入館舍，也為後來中朝士人的文化交流大開方便之門。<sup>42</sup>

「三藩之亂」初，清朝內部出現了鄭氏與朝鮮聯合反清的傳聞，這也迫使朝鮮不得不關注鄭氏政權，以隨機應變。顯宗十五年，燕行使俞瑒提到：「北京訛言，朝鮮與鄭錦合勢，互相驚動，及見臣等，訛言始息云矣。」<sup>43</sup> 同年冬，陳慰使和進香使也帶回相似情報，「鳳凰城、蓋州衛，將欲築城云。臣愚以為，（清）不獨慮鄭錦，亦必疑我而然也」，<sup>44</sup> 時刻擔心清朝問罪的朝鮮王朝，更需要掌握鄭氏情報以應對清朝查詢。

## （二）朝鮮王朝對鄭氏政權的特殊關注

朝鮮王朝對中國情報的搜集是全方位的，舉清朝山川地勢、農工商情、外藩動態、官府情偽、軍事部署及動態、政府組織及任官、天下錢糧、

41 （韓）洪大容，《溇軒燕記》（《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248 冊，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外集卷 7〈衙門諸官〉，頁 250a。

42 孫衛國，〈明清時期歷代帝王廟的演變與朝鮮使臣之認識〉，《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5(2016.10): 86。

43 《朝鮮顯宗改修實錄》第 38 冊，「顯宗十五年八月甲午」條，頁 197。

44 《朝鮮肅宗實錄》第 38 冊，「肅宗即位年十一月壬午」條，頁 222。

科舉學術、叛亂情形等等。<sup>45</sup> 僅是對鄭氏情報的搜集，就涉及諸多內容，綜合來看，朝鮮王朝對鄭氏政權的特殊關注分三類：

其一，關注鄭氏政權基本情況，如主要人物及勢力範圍、地理與歷史沿革、經濟活動等。1667年林寅觀等臺灣官商漂至朝鮮時，朝鮮遣譯官與之溝通：

漂人等自言：「泉州人，為清所侵，避入東寧。」東寧乃南海中島嶼，而屬於福建也。譯曰：「汝所持官貨，未知何官之物乎。」對曰：「藩王與鄭徑（經）之物也。」……鄭徑（經）者，成功之子也，成功死，永曆襲封為王，辭以無汗馬之勞，自稱嗣封世子，入據東南海島中，服事永曆。<sup>46</sup>

不僅官方關心，朝鮮儒生士人亦好奇鄭氏政權具體情況，忠清道監司李敏迪、光州柳世翊等人在筆談中就永曆政權與鄭氏政權轄屬範圍及二者關係、鄭氏人物、對日貿易、地理距離等情況進行了詢問：

問：聞有南方鄭將軍專據海方，兵力最強云。今在何地方？所割幾省耶？

答：現在據守福建地方，乃我先藩招討大將軍子也。甲辰年，永曆君敕命襲封延平王，共有四省地方也……

問：永曆建都於四川，則成都為京邑耶？延平王有四省地方，則何省地耶？延平王乃鄭都督芝龍之孫耶？

答：延平王乃鄭都督孫也，受封割據福建地方，連續永曆君川內及廣西、廣東，共四省之地也。

問：以何人標下，行貨於日本耶？長崎距福建幾日程耶？

答：延平王受封據守，軍需浩大，錢穀不足以供請命，故暫准權宜。

45 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頁112。

46 《朝鮮顯宗實錄》第36冊，「顯宗八年十月甲戌」條，頁566。

即將本國聊產藥材砂糖鹿皮諸貨，逐年發販外國，少佐軍需……長崎至福建水道。順風八九日也。<sup>47</sup>

即使鄭克塽降清後，若遇中國沿海商船漂來，朝鮮仍會就鄭氏政權近況進行詢問。如 1687 年對顧如商等人的問情別單，不僅涉及閩越臺等中國沿海地方的地理位置及歷史沿革，也十分關心鄭氏降清後的清朝海防問題。<sup>48</sup> 次年，對曾係鄭經部下之沈電如一行的詢問中，同樣出現對海禁政策及鄭克塽降清後的遭遇等問題。<sup>49</sup> 在缺乏官方直接往來的情況下，朝鮮王朝通過主動搜集情報，對鄭氏主要人物、勢力範圍、經濟活動以及軍事力量均有所瞭解，對政局的變化和對政治背景的理解也顯示出較高水準。這些情報中的重要部分通常會直接上報朝鮮國王，作為決策的參考資料。

其二，關注鄭氏政權的反清活動，如前文所載鄭成功數次抗清戰役、鄭氏政權在「三藩之亂」中的行動等。此外，無論是燕行使、漂流民還是與日本的情報往來，鄭氏政權乞師日本之舉，均引起朝鮮王朝相當程度的關注。南明官商徐勝等人面對朝鮮詢問時，便提到了渡海目的：「芝龍以經用不足，請於皇帝，令我等領官銀貿販，以助軍餉。我等於今年五月，駕船於東浦察向日本，七月七日，漂到貴國。」<sup>50</sup> 其後，林寅觀等人到來，在筆談中提及「有藩王與日本國王書」，引起朝鮮人的強烈興趣：

酒半，培進曰：「藩主與日本國王書，雖失於漂沉之時，而書中大旨則必有聞知，望示其概略，幸甚。附寄之書，皆有請救之意，當以何時為聚兵之期乎……」答曰：「我先藩托隆武君，在位二年而崩，次扶永曆君，隨有賜姓，敕封延平王也。今我藩主奉敕世襲，而我藩志在恢復，未有汗馬，未敢受封，只受嗣封世子之職，而有書與日本王，

47 (韓)成海應，《研經濟全集》外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277 冊），卷 34〈丁未傳信錄·漂人問答·李敏迪〉，頁 16。

48 《備邊司謄錄》第 41 冊，「肅宗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濟州에 표류한 중국인의 사정을 물은別單을 올리는備邊司의啓」，頁 44b。

49 《備邊司謄錄》第 42 冊，「肅宗十四年九月二十日·濟州漂流漢人에게情狀을 물은別單」，頁 79a。

50 《朝鮮仁祖實錄》第 35 冊，「仁祖二十五年七月丁巳」條，頁 306。

乃前年日本王許兵相助，而我藩屢年營生長者數十萬，寄日本王候，奉敕會聚兵馬，欲載回以佐軍。精書意寅不得深知，但今年四月末，清朝差使孔姓名孟章，共文武四位，欲與我藩議和，而我藩即欲啟聞國君。寅等欲乘風開船，此書預先寄來，寅等未知後事。然此後定有數大船續來日本矣，其意聚兵，亦未知定期耳。」<sup>51</sup>

儘管書信已漂沉不可見，朝鮮仍在意鄭氏致書日本的原因及雙方是否存在軍事約定，林寅觀等亦據實相告，坦白日本與鄭氏有約在前，他們此行，貿易只是目的之一，更重要的，是向日本乞師以助反清復明。肅宗二年正月，慶尙道觀察使鄭重徽上疏報告：

吳三桂、鄭錦舍事情，探問島倭……鄭錦舍因薩摩太守請兵於日本事，亦為探問，則島倭等以為：「十餘年前，錦舍之父谷泉屋，請兵於日本，而大君不許。」云，而錦舍之請兵，未有聞也。但今春錦舍將有借兵之意，私通於其叔七左衛門，則七左衛門，轉達於長崎守，使之聞於江戶，不特不許，大責長崎守，使不得相通。<sup>52</sup>

日本雖未正式出兵，但在與對馬島的資訊往來中，鄭氏政權如何參與「三藩之亂」、雙方戰況、乞師日本之來龍去脈，仍作為重要情報被朝鮮王朝所關注。

其三，尤其關注與朝鮮王朝相關之鄭氏傳聞。前文提到，「三藩之亂」初，北京有「朝鮮興兵入來之說」，進香正使閔點復命，言：

概聞南北相持屢戰，而清兵多敗，盡發寧古塔、瀋陽之兵，敵兵若近北京，則想有土崩之勢矣。臣等持方物入闕，有一女子持酒饋譯官曰：「北京夏間，有朝鮮興兵入來之說，吾屬將欲避亂，使价頻來，今無憂矣。」以此推之，彼之不信我國可知矣。<sup>53</sup>

51 (韓)成海應，《研經濟全集》外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77冊)，卷33〈丁未傳信錄·溧人問答·李瑣〉，頁14。

52 《朝鮮肅宗實錄》第38冊，「肅宗二年正月丙申」條，頁318。

53 同上註，「肅宗即位年十一月壬午」條，頁222。

可見清廷與朝鮮王朝此時互不信任，清朝擔心鄭經與朝鮮聯合，故欲在邊境築城，朝鮮亦認為應及時修繕防禦工事以備清朝來襲。次年，清朝在遼河附近增加瞭望守衛，朝鮮也第一時間關注到了清朝這一防備態勢，《朝鮮肅宗實錄》載：「遼民虛警我國導鄭錦（經）入寇，至有避亂者云。遼河以東望海亭以上，設防守十餘處，各置五人瞭望云。」許積進一步詢問「木柵之說」是否可信，前秋使臣沈益顯回答：「聞關內有識者之言，海邊木柵蔽潮而來，疑鄭錦在近地造船，故邊一帶，另加審察云矣。」<sup>54</sup>不僅擔心清朝，朝鮮亦害怕鄭經會因清鮮宗藩關係渡海來犯。肅宗二年，朝鮮有「偽造倭人書傳播」，<sup>55</sup>稱「鄭錦已整兵船將，與本國有事於中原，欲與貴國共事，而前日書契，貴國稱以漠然不知。然則鄭錦之兵當先到貴國，交好之間，不可不告。」<sup>56</sup>在朝鮮引起軒然大波。

### （三）朝鮮所獲鄭氏情報之準確性

就情報的準確性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朝鮮王朝官方所載之鄭氏政權情報更符合實際，但也有長久存在的誤解和認知偏差。首先，混淆或不了解鄭芝龍、鄭成功和鄭經等鄭氏主要人物及各自經歷，如顯宗四年（1663），燕行使情報中才提及鄭芝龍降清之事，<sup>57</sup>但鄭芝龍早在 1661 年就已被清斬首，鄭成功亦於上年五月病亡，此時已是鄭經掌權，可見此時朝鮮使臣對鄭氏具體情況並未完全掌握，情報搜集存在較大的時間差。至「三藩之亂」爆發後，顯宗仍對鄭經之姓名存在疑惑，詢問：「鄭錦或謂鄭經者，何也？」大臣回覆：「錦與經，漢音相近故也。」<sup>58</sup>不僅如此，朝鮮王朝更是錯誤理解鄭氏政權與三藩之關係，將鄭經與耿精忠、吳三桂所結同盟理解成從屬關係，認為「鄭芝龍之子二舍皆以兵屬三桂」。<sup>59</sup>至

54 《朝鮮肅宗實錄》第 38 冊，「肅宗元年一月乙酉」條，頁 241。

55 《朝鮮肅宗實錄補闕正誤》第 38 冊，「肅宗二年六月丙辰」條，頁 342。

56 《朝鮮肅宗實錄》第 38 冊，「肅宗二年二月丁卯」條，頁 322。

57 《朝鮮顯宗改修實錄》第 37 冊，「顯宗四年三月己巳」條，頁 306。

58 同上註，第 38 冊，「顯宗十五年八月甲午」條，頁 197。

59 《同文彙考》第 2 冊補編，卷 1〈使臣別單一〉「癸丑（顯宗十四年）謝恩兼冬至行書狀官李宇鼎聞見事件」，頁 1578。



康熙五十三年（1714），鄭氏政權早已不存，燕行使彙報其出使期間「細問南方事情」，言：

臺灣幅員甚廣，東南幾百里，險要高峻亦如之，山上多產寶物，而水土甚惡，一染其毒鮮有生者，不慣風土之人不敢出入府內，地則泉甘土沃，去陸絕遠，故鄭錦率明末流民及朱氏子孫入居於此，不改衣冠矣。耿精忠敗後，鄭錦歸順於清，則府民入山深據，不肯通款，故清於彭灣之間多置將兵以防後慮……<sup>60</sup>

說明朝鮮君臣此時仍對中國南方情況感興趣，對臺灣地形地貌、風土之類更加瞭解，但對鄭氏主要人物的認知仍存在混亂，將鄭芝龍、鄭成功和鄭克塽的事蹟均安在鄭經一人身上。

偏差尤為嚴重的，是對鄭氏政權地理位置的認識，如肅宗五年（1679），在討論對罪臣的流放之地時，許積提出：「置之近地，亦恐有往來浮薄之言，擇其遠島中，無瘴癘處以送矣。或有以濟州近於鄭錦所居，為慮者矣。」<sup>61</sup> 後又以為，鄭經所據海島「與日本、朝鮮相近」，從而產生鄭氏政權會借道朝鮮或聯合朝鮮攻打清朝的想法。<sup>62</sup> 當然，朝鮮王朝對鄭氏情報並非全然相信，而是時常在朝議中對情報真實性進行辨析。1682年，奏請兼冬至使南二星等人在北京會同館遇琉球使臣，遂通過譯官向琉球通事謝宣瞭解鄭經情況，謝宣介紹鄭經所據「島名即臺灣，一名東寧，在福建東南五千餘里」，<sup>63</sup> 後又得知鄭經答福建總督書的內容，南二星據此分析：「鄭錦書中有南極高遼，北指東瀛等語，東瀛似指日本；高遼似指我國，而此特外為大言，其實窮蹙不能自振云，於我似無可虞矣……雖不可臆斷，鄭錦形勢，似難越海侵人國矣。」<sup>64</sup> 雖有對鄭經來犯

60 《同文彙考》第3冊補編，卷3〈使臣別單三〉「甲午（肅宗四十年）別齋咨官李樞手本」，頁3128-3129。

61 《朝鮮肅宗實錄》第38冊，「肅宗五年十二月己丑」條，頁429。

62 《同文彙考》第2冊補編，卷2〈使臣別單二〉「辛酉（肅宗七年）謝恩行書狀官李三錫聞見事件」，頁1590。

63 《朝鮮肅宗實錄》第38冊，「肅宗八年三月庚戌」條，頁585。

64 同上註。

的擔心，但分析形勢後亦認為越海侵襲的可能性微小。可知此時朝鮮君臣對於鄭氏政權的認識準確性逐漸提高，能客觀分析多方勢力並做出判斷。

#### 四、鄭氏情報與朝鮮王朝之應對

面對明清鼎革之際風雲變幻的東亞局勢，朝鮮王朝從自身利益出發，積極搜集各方情報，這也影響著朝鮮國內政策制定與中朝關係的發展。十七世紀中後期，朝鮮王朝因丁未漂流民事件調整了處理漂流民的政策；在清「三藩之亂」中，朝鮮國內針對鄭氏情報引發了關於築城設防和渡海通鄭之議；傳遞著鄭氏侵朝傳聞的「偽倭書」，更在朝鮮王朝造成了政治血案。

##### （一）處理漂流民政策的調整

丁未年（1667）漂流民到來後，朝鮮王朝就如何處理林寅觀一行展開了激烈爭論。最終，頂著漂流民與義理派不斷投書抗議的巨大壓力，顯宗還是下令將一行人押送北京。<sup>65</sup>但「人既入北京，則盡送於寧古塔，地方官盡殺之」。<sup>66</sup>

這一結局使朝鮮士人們十分痛心。為避免此類悲劇再次發生，朝鮮開始改變押送漂人入京的政策。<sup>67</sup>當顯宗十一年（1670）七月漂漢人沈三等到來之後，朝鮮選擇尊重漂人「往長崎」之意願，並「裝船送還」。<sup>68</sup>肅宗即位後，領議政許積在關注鄭氏政權的同時，提出了處理漂流船的意見：

濟州乃鄭錦舍船往來日本之路也。瞭望之事，不可不著實……意外有他船泊著之時，則不必執捉，使之任歸。既捉漢人，則不可入送北京，若其船破，則其人處置極難。若給船則恐或漏泄於彼中，又不忍送於

65 《朝鮮肅宗實錄》第 36 冊，「顯宗八年十月甲戌」條，頁 566。

66 （韓）成海應，《研經齋全集》外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277 冊），卷 33〈丁未傳信錄·漂人問答·李瑱〉，頁 22。

67 1644 年前往長崎貿易的廣東商船漂流至朝鮮，朝鮮將其送至日本，激起清廷強烈不滿，在清政府高壓下改變中國漂流民處理方式，改押送北京。參考崔英花，〈清代東亞海域和朝鮮對中國漂流民的救助制度〉，《海交史研究》2020.4(2020.12): 100。

68 《朝鮮王朝顯宗改修實錄》第 38 冊，「顯宗十一年七月丙寅」條，頁 28。

北京。惟故失一船，容彼竊去，佯若不知可也。<sup>69</sup>

肅宗也十分贊同這一做法，「立以此分付」。至肅宗八年（1682），更進一步明確：「唐船之漂到者，勿許登陸，亦勿狀聞之意，密諭牧官，以為永久遵行之地矣。」<sup>70</sup> 利用祕密方式將漂漢人放歸，既不驚擾清朝，也保護了漂漢人，保全了對明義理，這是朝鮮王朝在尊周思明思想下所能想到的最穩妥的處理方式。

但這種方式並未持續太久。1683年鄭克塽降清，臺灣被納入清朝版圖，1684年清朝解除海禁，從事海上貿易的人數大增。為維護與清朝的關係，朝鮮王朝對待中國漂流民的政策再次改變，以清廷禮部己巳年（1689）的咨文為基礎，朝鮮的漂流民救助制度形成，並成為以清王朝為中心的東亞海域秩序的一部分。<sup>71</sup>

## （二）築城設防事

朝鮮雖表面上仍履行著藩屬國義務，但對清朝是否能在中原長期穩定地統治十分懷疑，且清朝最初對朝鮮並不信任，加重了朝鮮對於清朝敗退後會再次入侵半島的危機感。伴隨著鄭氏渡海而來的傳聞，朝鮮如臨大敵，如何應對這一局面，君臣內部產生了巨大分歧。掌權的「南人」黨分為以尹鑄為首的激進派和以許積為首的保守派，雙方分別主張主動參與和被動防禦。保守派以避禍為出發點，謀求朝鮮國內的邊防與海防。咸鏡監司南九萬率先上疏，建議朝鮮設鎮駐防，但清崇德二年「丁丑約條」規定，朝鮮西路未經清朝允許不得修築「新舊城垣」。<sup>72</sup> 故築城一事在朝鮮引發熱議。

肅宗即位年（1674），領議政許積得知清在「三藩之亂」中多次失利，且欲在清鮮邊境築城，故認為宜「令諸道州郡邑，城好則仍築之，山城好則增修之，脫有緩急，民兵各入其城」，<sup>73</sup> 主張築城禦敵。但清風府院君

69 《朝鮮肅宗實錄》第38冊，「肅宗二年一月丁未」條，頁319。

70 同上註，第38冊，「肅宗八年六月乙未」條，頁592。

71 崔英花，〈清代東亞海域和朝鮮對中國漂流民的救助制度〉：101。

72 《清太宗實錄》，卷33「崇德二年正月戊辰」條，頁431。

73 《朝鮮肅宗實錄》第38冊，「肅宗即位年十一月壬午」條，頁222。

金佑明等考慮到朝鮮國內局勢不穩，認為「吳三桂、鄭錦，斷無來此之理，而國中人心，極惡……當此之時，何為汲汲於築城海防等事耶？」以安民心為由，極力反對大興土木。兵曹判書權大運從清鮮關係出發，建議應先派使臣前往清國呈文請示，知事柳赫然也認為築城之事應當謹慎：「若果海船，則此事誠當矣。渠若或疑吾國有所候望，則此事極為迂闊。我國既無所備，而經生致疑之端，甚不可矣。」<sup>74</sup>均擔心貿然築城會遭致清朝和鄭氏雙方的懷疑。尤其此前遼瀋之人已有朝鮮人襲清的謠言，連許積也認為「南方則雖不言，可以為之，兩西則不可不言而為之」。<sup>75</sup>實際上，在朝議之前的半個月，大通官張孝禮與譯官便有過如下對話：

大通官張孝禮等，問於譯輩曰：「本國地方距福建幾何？福建兵禍，不無延及於本國之慮，海防器械，曾無修治否乎？」譯官答以：「我國曾不通路，何由知福建之遠近，而器械雖欲修治，無上國之令何？」孝禮曰：「何不陳請上國乎？」譯官輩答以：「自我先請，有所不敢。自上國有令，可以修治矣。」<sup>76</sup>

可見朝鮮十分忌憚清朝禁令，既想整修國防以備軍需，又擔心招致清朝責難。副提學金錫胄和此前率先上疏的南九萬雖主張築城，但反對向清請示，前者以為今時不同往日，即便不請示，清朝自顧不暇，「似不得致責於我」，後者進一步指出，咨請可能使原本能築城的地方也受到影響，建議暗地進行。<sup>77</sup>

次年三月，冬至兼謝恩使李楨彙報，清國「疑我貳於鄭錦，關外鎮堡，添兵防守」，「胡皇」甚至親往教場練兵。<sup>78</sup>最終，許積經過再三思考，認可自行築城，亦得到肅宗首肯。至於可能遭到清朝詰問之憂，肅宗表示「可諉之以備他盜」。<sup>79</sup>除防範南方可能來犯的鄭氏政權，出於對日本的不

74 (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第 245 冊(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70)，「肅宗元年二月辛卯」條，頁 12a。

75 同上註。

76 《朝鮮肅宗實錄》第 38 冊，「肅宗即位年十一月丙寅」條，頁 218。

77 同上註，「肅宗即位年十一月己卯」條，頁 220。

78 同上註，「肅宗元年三月癸亥」條，頁 249。

79 同上註，「肅宗二年二月乙卯」條，頁 320。

信任，承旨權大載提議在東萊府及其府後的金井山和梵魚寺兩處修築山城，亦得到許積和肅宗的支持，於是朝鮮南部地區以「防倭」、「防盜」為名義的築城運動由此拉開序幕。<sup>80</sup> 築城最典型的是大興和江都城，大興為松都民地，一朝有變，可以策應，為朝鮮東部保障之地。江都為軍糧儲備之地，其時盡為民用。<sup>81</sup>

### （三）渡海通鄭之議

築城之議儘管曲折，但終得以完成，受到朝鮮內政與黨爭影響更大的，則在於是否「渡海通鄭」。這一主張與築城之議同時提出，在朝堂中引起強烈震蕩，從中亦可看出朝鮮君臣對鄭氏政權之不同看法。

肅宗元年（1675），國王詢問「兩西軍政修治之意」，尹鑄直言：

今日之憂，唯在於鄭錦之猝迫海邊，清虜之充斥西路，前秋虛警，亦非無根之事。以此告急於清國，請得繕治兵事，且我服事清國，鄭錦之所嘗疑而忿之者也。今與吳三桂合力，其勢甚張，恐有聲罪致討之患。一介浮海，以致誠心，似不可已。頃者水原儒生李啟祥上疏，自請渡海。如此之人，特加嘉獎，則必有繼起之人。瞭望一事，亦宜申飭。<sup>82</sup>

許積對瞭望之事並無異議，但強烈反對渡海通鄭的主張，認為鄭經「其祖芝龍，初叛大明，竊據海盜，在我為賊」，向來尊明之朝鮮不可與曾有叛明之舉的鄭氏政權相通。尹鑄則指出，此時鄭氏奉朱明之後裔，朝鮮才是背明奉清的一方，鄭氏必有「仗義侵我之意」，若主動與之通好，無異於「坐卻十萬兵」，用外交手段化解可能存在的兵禍。對此，許積從渡海的可行性和風險兩方面進行反駁：

80 劉曉東，〈日本九州大學圖書館藏《梵魚寺事蹟》考述——兼及「三藩之亂」與朝鮮肅宗時期的築城運動〉，《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21.1(2021.2): 6。

81 樊延明，〈論「三藩之亂」時期朝鮮與清朝的關係〉，收入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主編，《韓國學論文集》第8輯（北京：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1999），頁179。

82 《朝鮮肅宗實錄》第38冊，「肅宗元年正月癸未」條，頁240。

鄭錦不知何如人，亦未知的（地）在何許。萬頃滄波，何處可尋乎？若誤泊於清國之界，則必生大禍。且朝廷雖乏人，若可通使，則寧許一儒生之自請乎？李啟祥亦知朝廷之不送，故渠敢自請矣。<sup>83</sup>

在許積看來，朝鮮對鄭氏政權並不瞭解，且貿然遣使有被清發現的危險，還諷刺李啟祥，認為他是算准了朝廷不會遣送才自請渡海，為的只是自己的名聲。而尹鑄「聞其所居，與我國不遠」之語，則更驗證了此時朝鮮王朝對鄭氏政權的情況知之甚少。<sup>84</sup>

不久，清朝使者前來，朝鮮君臣對是否出迎一事產生爭論。尹鑄反對出迎，並提出對外三大主張，即北伐、渡海通鄭、與北絕和。但此時務實才是朝鮮主流意見，實錄中甚至認為尹鑄「其言大而無當」，「外假伐胡之名而出腳，故強為此高談，以掩人耳目，非實語也」。<sup>85</sup> 兩月餘，唐人黃功上疏請渡海奉使於鄭經，「且獻孝廟御筆，又言曉十八般武藝，願得教習武士」，<sup>86</sup> 尹鑄再次看到了希望。當許積和柳赫然歷數黃功好事貪功之行徑時，尹鑄則只強調其「渡海一節」甚好，聲明通鄭是為了免於清朝敗亡之後朝鮮的尷尬處境：

天下大亂，皆叛胡，而獨我國服事。他日中原恢復，我國何面目可立？今送一介使，通問於鄭錦，則庶有辭於他日。發遣四五輩，分道以行，則雖或不達，無害；能達則社稷之至計也。<sup>87</sup>

再次遭到許積和權大運的猛烈抨擊，若說此前是考慮到被清發現的隱患，此時則更突顯出對鄭氏政權的擔憂，「鄭錦若以我人誇示胡人，則大患生矣……錦必執我人，示胡曰：『服事渠矣』。」若是「錦問水路於我人，為前導而出來」，把使者當成入侵朝鮮的領路人，則是最為憂慮之事。許積始終堅持「錦乃叛明之人」，對其並無好感。史官也站在許積等人的立

83 《朝鮮肅宗實錄》第 38 冊，「肅宗元年正月癸未」條，頁 240。

84 同上註。

85 同上註，「肅宗元年二月丁酉」條，頁 244。

86 同上註，「肅宗元年四月己丑」條，頁 260。

87 同上註，「肅宗元年四月辛卯」條，頁 260。

場，評價：「李啟祥、黃功，非真有行意，知朝廷必不遣之，要賞而請行。許積曾陳啟祥事者，實得其情也。鑄亦非欲必送，既假此名而出，故浪說如此也。」<sup>88</sup> 故五月豐德幼學陳絢上疏請「文武中擇智謀異等者，為通信使，送於鄭錦海島，憑寄檄書於吳三桂，以約某月某日興兵協力之期」時，許積直言此事「不可更論」。<sup>89</sup>

此後，燕行使臣也帶回鄭氏之傳聞：「錦與胡戰，一軍以笠帽，效我人服色，故清人疑我……甲寅十月，自海西有訛言，京外大擾，或言非虛驚，乃鄭錦舟師自海向登萊，海邊人傳相告語，以致此云。」恰逢對馬島太守通信朝鮮，探聽清朝情報，尹鑄便想藉由日本溝通鄭氏，但其他人均欲將倭書告知清朝，雙方爭執不下。<sup>90</sup> 幾天後，尹鑄支持者柳潤再次「請浮海入鄭錦軍中，與之通信」，並舉出天象之所指，認為「明必興，胡必亡」。肅宗終於出面，給出十分現實而無奈的回絕：「予豈無雪恥憤惋之心哉？為其勢之不敵，尤為恨歎。」<sup>91</sup>

至肅宗二年，朝鮮嚴禁有關北伐之上疏，渡海通鄭作為「北伐」的南路配合主張，也不再被提起。可見，儘管朝鮮在義理上十分渴望趁清「三藩之亂」有所行動，但也清楚地知道「清國雖疲，制我則有餘」，<sup>92</sup> 加之十七世紀後半葉朝鮮國內存在嚴重的災荒，「八路大饑，畿湖尤甚，都城內積屍如山」，<sup>93</sup> 还是在清朝的幫助下才得以度過災荒。最終，「渡海通鄭」也只停留在朝議層面，不僅未付諸行動，甚至成為黨爭的重要輿論戰場。

#### (四) 作偽倭書事

對鄭氏政權的擔憂並未隨著渡海通鄭意見的否定而消失，肅宗二年二月備忘記中記載：「方今天下之大亂，鄭錦之睥睨、海島之乘機，不可

88 《朝鮮肅宗實錄》，「肅宗元年四月辛卯」條，頁 260。

89 同上註，「肅宗元年五月辛未」條，頁 274。

90 同上註，「肅宗元年六月庚申」條，頁 287。

91 同上註，「肅宗元年六月甲子」條，頁 288。

92 同上註，「肅宗即位年十一月壬申」條，頁 221。

93 同上註，第 39 冊，「肅宗二十三年十月庚午」條，頁 472。

不深慮。」<sup>94</sup> 此時發生的對馬倭書事件更是加重了朝鮮對鄭氏可能存在威脅的憂慮。<sup>95</sup>

前文提到，日朝情報往來存在互不信任的情況，尤其是肅宗九年十二月的對馬倭書，有鄭經越海萬里攻朝鮮之說，朝鮮內部討論了情報虛實。其中，金錫胄認為，雖從地理位置上判斷鄭經渡海侵朝的可能性極低，但按照此前鄭經與福建官員的通信所示：「掛一帆，則似可至高麗，何地不可立國？且古之主東土者，率多自異域來，箕子、衛滿是也。」<sup>96</sup> 不能掉以輕心。禮曹判書尹趾完則從自身出使日本的情況，及對對馬島方面的瞭解，認為倭書所傳定是日方虛假情報，想迷惑朝鮮以達成自己的目的，言倭書「詐而非誠」。<sup>97</sup> 之後朝鮮甚至花重金向日本打探情報之真假，但日本只是將責任推給了長崎漢商。蹊蹺的是，對馬倭書到來不久，清閣老明珠就詢問使臣「自日本有書來否」，且問「向因倭書，汝國騷屑」，<sup>98</sup> 可見清朝對日朝情報往來有所耳聞，但清朝所問具體為哪封倭書則並不明確，因此朝鮮對前一年冬的這封虛實難辨之倭書更為懷疑，也展開了一系列調查。

事件發生六年後（1689），朝鮮人李師命被囚，稱「癸亥春，在湖營，軍官辛範得一幅匿名書，是海外難測之事，故送示於金錫胄」，沒曾想與當年冬天倭書所言一致，而「海外難測之事」正是鄭氏政權欲入侵朝鮮。據書狀官李蕃晚奏報，上述流言乃因寧古塔守將傳到清朝兵部所致，其書稱以「癸亥十二月二十五日，朝鮮人偷過（邊界），言朝鮮與倭通，謀不軌」。但朝鮮收到倭書在二十二日，三天之內難以從朝鮮傳到三千里外的寧古塔。結合種種因素，朝鮮判斷，所謂「倭書匿名書，同出於一二人之手，而或托於倭人，或傳於彼地，必欲假借他國，嫁禍異己，而畢竟寧固

94 《朝鮮肅宗實錄》第 38 冊，「肅宗二年二月壬戌」條，頁 322。

95 關於朝鮮所獲對馬倭書的研究，可參考劉曉東，〈康熙朝「三道溝事件」的處置與對馬倭書〉，《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36(2021.5): 57-65；陳波，〈對馬倭書與朝鮮傳聞——朝鮮與日本圍繞三藩之亂的情報交涉〉：1-18。

96 《朝鮮肅宗實錄》第 38 冊，「肅宗十年一月乙酉」條，頁 676。

97 同上註。

98 同上註，第 39 冊，「肅宗十五年閏三月戊戌」條，頁 164。



之將，加不軌之名於國家」，權大載又補充：「倭人文字，自有其體，今見所謂倭書，酷似我國文體，當初尹趾完以為虛罔者，此也。」更加確定了倭書之作偽，至於作偽的原因，則是朝鮮內部的「矢志之士」想要藉清朝的責難排除異己。<sup>99</sup> 在「偽倭書」事件中，可以看出朝鮮王朝對鄭氏政權情報的掌握程度，若未提前得知鄭氏政權投降的消息，很有可能因恐懼而引發朝鮮內部騷亂。但也正是在梳理虛假情報如何傳到朝鮮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對鄭氏情報所做出的現實應對背後，並非朝鮮與鄭氏政權之間直接較量，而是朝鮮王朝的文化心態和內部的權力鬥爭。

## 五、結 論

朝鮮王朝對臺灣鄭氏政權的關注，作為清代中朝關係中的一個支流，既是檢視朝鮮尊周思明理念的一個外在因素，也是透視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一股潛流，從而豐富我們對所謂宗藩關係的深入瞭解，這種關係往往有多邊因素和多重視角。

朝鮮搜集鄭氏政權情報的途徑主要有三，且特色各異：其一是燕行使報告，因每年數次出使清朝，這部分情報數量最多，主要通過購買違禁書籍、賄賂清朝官員或漢族士人、收購清朝公文，及與他國使臣交流等方式獲取，廣泛存在於朝鮮王朝官私文獻中。但來源龐雜也意味著情報準確性需要進一步辨析。其次是漂流民所提供的鄭氏情報。由於朝鮮王朝與鄭氏政權少有官方直接接觸，漂流民成為溝通二者的重要途徑，如 1667 年臺灣鄭氏官商林寅觀一行，就帶給朝鮮豐富的中國情報。這部分情報來自鄭氏政權內部成員，故準確性較高，南明漂流民的處理問題也引發朝鮮廣泛討論。最後，日本亦是鄭氏情報的重要來源。早在壬辰戰爭時，東亞中、日、朝及琉球等幾個主要國家之間就已建立起了龐大的情報網絡。明清鼎革之際，清朝與日本並無官方往來，但日本通過長崎港、對馬藩與薩摩藩，分別從往來商船、朝鮮及琉球處獲取中國情報。鄭氏政權在經濟上與日本交往密切，政治上由於特殊的血緣關係曾多次向日本乞師。又因明

99 《朝鮮肅宗實錄》第 39 冊，「肅宗十五年閏三月戊戌」條，頁 164。

末清初，大批具有民族氣節的中國人遠走海外，東渡日本成為此次移居潮流的重要去向。<sup>100</sup> 故日本較朝鮮王朝，更易獲得鄭氏政權情報，準確性也更高。日朝之間情報交流存在嚴重的信任危機，雙方存在刻意瞞報或謊報的情況。但考慮到政權穩定等因素，朝鮮仍十分重視日方情報。

綜合來看，朝鮮所獲鄭氏政權情報特點有三：從時間分布上，「三藩之亂」時期鄭氏政權情報最為豐富，這既因為「三藩之亂」使得朝鮮尊周派人士看到了反清復明的希望，也由於此時出現了與朝鮮相關的鄭氏傳聞；從關注點上，鄭氏政權的基本情況、反清活動、威脅朝鮮安全的傳聞等，是朝鮮王朝的重點關照；從情報的準確性上看，朝鮮王朝對鄭氏政權日漸熟悉，但由於始終沒有官方往來，仍存在長久的認知偏差。

情報搜集是朝鮮王朝對鄭氏政權形成認知與想像的基礎，也影響著朝鮮的內政外交，如丁未漂流民被遣送回清後的悲慘遭遇，使朝鮮調整了處理漂流民的政策，鄭氏降清之後，清鮮關係緩和，才形成雙方透明公開的漂流民救助制度。而面對「三藩之亂」期間鄭氏政權入侵朝鮮的傳聞及清朝的懷疑，朝鮮內部引發了關於築城設防、渡海通鄭等熱議，前者得以落實，而後者則停留在討論層面，甚至有朝鮮人藉機偽造倭書以求排除異己，降清之鄭氏政權已然淪為朝鮮黨爭的工具。

從燕行使、漂流人，及與日本的情報往來三條途徑，朝鮮王朝全方位搜集與鄭氏政權相關資訊，朝鮮對所獲情報之現實應對也讓我們清晰地瞭解到，在交通不便、山川阻隔的古代社會，資訊如何在不同國家與政權之間流動、演變並引起反響。

---

100 周中堅，〈明遺民東渡及其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海交史研究》1992.2(1992.6): 50。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邵廷采等著，《東南紀事（外十二種）》，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 （日）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韓）成海應，《研經齋全集》，收入（韓）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74-278冊，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 （日）林春勝、林信篤，《華夷變態》，東京：東方書店，1981。
- （日）林煌等編，《通航一覽》，大阪：清文堂出版，1967。
- （韓）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韓）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冊，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
- （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
- （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70。
- （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同文彙考》，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78。
- （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備邊司謄錄》，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82。
- （韓）禮曹典客司編，《邊例集要》，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憲宗七年（1841）以後筆寫本（番號：奎貴2089）。

### 二、近人論著

- 丁晨楠 2019 〈明清鼎革期朝鮮的明朝塘報搜集與應對〉，《韓國研究論叢》37.1 (2019.6): 17-28。
- 丁晨楠 2021 〈16世紀朝鮮對明朝情報的搜集與應對〉，《古代文明》15.1(2021.1): 145-160。
- （日）夫馬進 2007 《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 （日）夫馬進著，伍躍譯 2010 《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牛建強 2008 〈從風說書看日本德川幕府對清朝情勢的關注〉，《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6(2008.11): 75-80。

- 王桂東、達力扎布 2013 〈清「三藩之亂」期間朝鮮對清朝情報的搜集〉，《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4.4(2013.8): 60-63。
- 仲光亮 2013 〈從臺灣朱一貴起義資訊看日本江戶幕府的情報網絡〉，《歷史檔案》2013.2(2013.6): 62-69。
- 沈玉慧 2009 〈清代北京における朝鮮使節と琉球使節の邂逅〉，《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37(2009.3): 93-114。
- 沈玉慧 2011a 〈清代北京における朝貢使節間の交流——朝鮮・琉球使節を例とし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39(2011.4): 112-144。
- 沈玉慧 2011b 〈清代朝鮮使節在北京的琉球情報收集〉，《漢學研究》29.3(2011.9): 155-190。
- 沈玉慧 2013 〈清代朝鮮燕行使による琉球情報の収集——使節交流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學報》94.4(2013.3): 31-64。
- 周中堅 1992 〈明遺民東渡及其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海交史研究》1992.2(1992.6): 50-55。
- (日) 松浦章 2010 《近世東アジア海域の文化交渉》，京都：思文閣出版。
- (日) 松浦章 2011 《清代中国琉球交渉史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
- (韓) 金文植 2012 〈成海應이 증보한 〈丁未傳信錄〉〉，《震檀學報》115(2012.8): 93-122。
- (韓) 金昌洙 2012 〈17 세기 후반 朝鮮使臣의 공식보고와 정치적 과장〉，《사학연구》106(2012.6): 141-173。
- (韓) 禹仁秀 2010 〈17 세기 후반 台灣 鄭氏海上勢力에 대한 조선의 정보 수집과 그 의미〉，《대구사학》8(2010): 163-187。
- (韓) 禹景燮 2019 〈명청교체기 조선에 표류한 漢人들—— 1667년 林寅觀 사건을 중심으로〉，《朝鮮時代史學報》88(2019.3): 47-76。
- 孫文 2009 「《華夷變態》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獻學博士論文。
- 孫衛國 2007a 〈義理與現實的衝突：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之尊明貶清文化心態〉，《漢學研究》25.2(2007.12): 187-210。
- 孫衛國 2007b 《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
- 孫衛國 2016 〈明清時期歷代帝王廟的演變與朝鮮使臣之認識〉，《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5(2016.10): 81-89。

- 孫衛國 2018 《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44-18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孫衛國 2021 《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修訂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日）浦廉一 1953 〈台灣鄭氏（特に鄭經）と朝鮮との關係〉，《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3(1953.2): 71-92。
- 高志超 2014 〈漢人漂流民與中朝、日朝間交涉（1641-1689）〉，《東北史地》2014.5(2014.10): 32-38。
- 崔英花 2020a 〈清代中國漂流民與朝鮮的中國情報收集〉，《韓國研究論叢》39.1(2020.6): 118-131。
- 崔英花 2020b 〈清代東亞海域和朝鮮對中國漂流民的救助制度〉，《海交史研究》2020.4(2020.12): 98-105。
- 張存武 1987 《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陳尙勝 1995 〈禮義觀與現實衝突——李朝政府對於清初漂流海商政策波動的研究〉，《韓國學論文集》第4輯，北京：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頁259-266。
- 陳尙勝 2014 〈論日本江戶幕府對清朝統一台灣問題的關注——以〈華夷變態〉為中心〉，《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2(2014.2): 120-128。
- 陳波 2015 〈對馬倭書與朝鮮傳聞——朝鮮與日本圍繞三藩之亂的情報交涉〉，《國家航海》13.4(2015.12): 1-18。
- 陳波 2017 〈三藩之亂期間琉球王國的外交抉擇——以〈華夷變態〉的記載為中心〉，《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32(2017.1): 103-114。
- 陳波 2018 〈明清鼎革期間清朝與朝鮮之間朝貢外交的實態——以〈燕行錄〉為中心的考察〉，《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34(2018): 302-317。
- 陳波 2022 《風說書的世界——東亞視域下的明清鼎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2015 《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黃普基 2018 〈十七世紀後期朝鮮王朝政壇的「奉清」「崇明」之辨——以1667年南明漂流民事件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2018.6): 76-83。

- (韓) 閔斗基 2020 〈16-17 세기 표류 중국인에 대한 조선의 인식과 대응 : 「人情」과 「大義」 및 「事大」라는 측면을 중심으로〉, 《해항도시문화고집학》 23(2020.10): 1-36。
- 程永超 2021 《華夷變態の東アジア : 近世日本・朝鮮・中国三国關係史の研究》, 大阪 : 清文堂出版。
- 樊延明 1999 〈論「三藩之亂」時期朝鮮與清朝的關係〉, 收入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主編, 《韓國學論文集》第 8 輯, 北京 : 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 頁 168-185。
- 鄭潔西 2017 《跨境人員、情報網絡、封貢危機 : 萬曆朝鮮戰爭與 16 世紀末的東亞》, 上海 :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 劉曉東 2021a 〈日本九州大學圖書館藏《梵魚寺事蹟》考述——兼及「三藩之亂」與朝鮮肅宗時期的築城運動〉,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2021.1(2021.2): 1-6。
- 劉曉東 2021b 〈康熙朝「三道溝事件」的處置與對馬倭書〉, 《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36(2021.5): 57-65。

## The Chosŏn Dynasty'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on the Zheng Regime in Taiwan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Lei Yuqing\*

### Abstract

Following the Qing conquest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Chosŏn (Joseon) dynasty was forced to become a vassal state of the Qing Empire, but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the Ming” 尊明 continued, exemplified by their active search for information on the Ming and Southern Ming regimes, such as concern for the the Zheng 鄭 family's rule in Taiwan under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However, the Chosŏn had little official contact with the Zheng regime and could only ascertain the situation through active intelligence gathering, the three main sources of which included Chosŏn envoys to Yenching, “wandering” merchants from China, namely *piaoliu min* 漂流民, and intelligence exchanges with Japan.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of this collected intelligence constitute a complex East Asian intelligence network, which also affected the internal and foreign affairs of the Chosŏn dynasty, such as adjustments in policy towards wandering peoples, the construction of fortifications, discussions on crossing the sea to Zheng, and the “Pseudo-Japanese Pirate Letter Incident” 偽倭書事件 that shook the Chosŏn. Moreover, it not only contains the Chosŏn dynasty's perception and imagination of the Zheng regime in Taiwan, but also assists us in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ncept of China in the Chosŏ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late Ming dynasty, early Qing dynasty, Korean Chosŏn (Joseon) dynasty, Zheng regime in Taiwan, Sino-Chosŏn relations, information exchanges

---

\* Lei Yuqing, PhD Candidate,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